

作者简介

宋文光，1934年8月生于温州，196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本科。曾任中共温州市委、金华地委宣传部长。1986年至1996年，担任中共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温州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荣获全国农村改革贡献奖。现任温州财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浙江省股份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试验　突破　创新

——温州改革试验10年

宋文光　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试验　突破　创新

——温州改革试验10年

宋文光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文宾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10002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32开本　7.5印张　18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 001～5 000册　　定价　15.00元

ISBN 7-109-05284-2/F・614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序

温州市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多年停滞不前，但在改革年代却大踏步前进，成为国内同类地区中发展最快，经济波动较小而稳定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比1978年增加14.69倍。

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80年是423元，同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65元，而1996年城市7 378元，农村3 371元。分别增长16.4倍和19.4倍。1996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74亿元，存贷顺差156亿元。

去温州访问的人，对这种发展速度，无不表示惊异，向有关干部问及缘由，一个县委书记一语道破，说：这是“生活逼出来，市场放出来，群众闯出来”的。

温州从近古到近代就是人多地少，资源贫瘠之地，至今，人口710万，人均耕地0.36亩，靠农业不足养生。广大农民必须农外求生，手工业和商运业成为赖以生存的主业。因有濒海之便，远在宋朝，就将温州置为通商口岸。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天津条约附件，更进而辟为外国进出自由的通商港口，设海关由外国人管理，一面引入洋油公司和其他各种外商洋行，一面扩大土特产出口，产品有陶器、纺织品、漆器、皮革，尤以“瓯绸”扬名四

海。“其货纤靡，其人善贾”为国外所称道。1930年进出口总值已达1 510万两白银。

民国时期，战祸频繁，洋货倾销，官府剥夺，经济逐渐衰落。此时温州居民侨居国外谋生者日众，他们自养有余，还可汇回少量剩余供家人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有所恢复，从1953年起，发起社会主义改造，家庭农业、手工业同时实行合作化，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以统购统销制度覆盖城乡，个体分散经营骤然停业，居民农外收入下降，户口迁移又受到限制，极端贫困人口靠乞讨度日的情况时有发生。区内永嘉、文成、泰顺3个山区县贫困度更高于其他各县。1956年全省完成合作化，农民为生计所迫，1957年永嘉县首创包产到户，波及全局，有千余生产队先后效法。值夏季反右派斗争，包产到户倡导者、积极附和者，均遭批判斗争，定罪为右派分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包产到户断断续续直至1970年末，未曾净化。外放式家庭手工业作为社队工业的一种形式，乘“文革”后期城市工厂停工闹革命空隙，又一度兴起。

在困难中挣扎，促使着温州人学到更多的求生本领。

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了。此时，党的政策正式倡导土地家庭承包。温州人看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家庭承包制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大办乡镇企业，他们也想一试身手。可是政府无力投资，银行不愿贷款，乡村集体积累人均不过0.45元。他们只好先搞贩运货物，搞点积累，继而靠传统方式，搞家庭工业，用废料和代用品作原料制造低档次、宽销路的产品，如钮扣、编织、电器小元件、牌证、皮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廉价出售，谋口饭吃。农村改革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机会，党中央国务院为鼓励发展商品经济，流通领域开放大部分农产品管制，允许兴办农贸市场，允许自带口粮进集镇从事工商业，允许从事长途贩运。80年代初这几项政策，意味着计划经济格局已被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启动。

市场制度，像一种自然力，它能驱动亿万群众自动努力，通过平等交换机制，用本身劳力和知识向社会提供生产品和服务，换取自身所需要商品，用以改善生活，并能赚得超额利润，积累剩余，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又聚合成不断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制度不是由任何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全体人类从古到今自发自生而成的社会产物。市场交换中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有如人们相互对弈，需要有游戏规则，商品交换，也需要有共同遵守的秩序，并通过法律契约、习惯乃至道德规范等各种形式稳定下来。这种秩序规范，不是人类社会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改进的学习过程。这就是说，它是一种历史性演变。这种演变在不同地区还会带着地方色彩。我们考察一个地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发展变化，必须把握住这种带有地方特征的历史性演变。按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对发展中的事物做出判断是容易的，但未必是准确的。对待温州也不例外。

“温州的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个定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色。就是这些老百姓，带着过去闯市场的经验，又受到当代市场机制推动，从家庭手工业起步，“拾遗补缺”制造小商品，占领大市场。这是符合自身条件，又适应国内市场需要的明智选择。

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新条件，他们在家庭手工业大量兴起的基础上，很快建起了一批专业市场，1989年底就有400多个，场内既有本地也有外地产品。逐步形成销售批发中心。为开拓销售渠道，还派出几十万销售员，遍布全国，既是销售进货网络，也是一个信息网络。全区先后吸收120万人就业。同时，形成一个效率高、成本低、秩序好的劳动市场。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温州全市作为农村改革试验区。对于温州工作来说，允许试验就意味着可以集中大众的实践经验，推动制度创新。这是一个新的机遇和起步点。他们较早地体会到必须探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和联合发展的道路。从而找到以资金、设备、田地、技术和劳力作股的股份合作制，区别于依附于政权的乡镇企业；它实行两权分离，区别于私营家族企业；向社会直接融资，区别于单纯靠银行贷款，负债经营的国营企业；有一定公共积累，吸收了合作制优点，区别于个体合伙企业。它适应于80年代初期的个体经济发展状况，此时，社会资金积累达到相当水平，分散的家庭工业，前店后厂的方式，已不能适应扩大生产批量，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扩充市场份额的新要求，但又不愿选用60年代集体经济模式，在今天已被政府法定通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时存在姓“社”姓“资”之争。他们先在苍南县试行这种股份合作制，看到了好处，从此推行于全温州各市、县、区。尽管这种形式还不够规范化，但把个体经济联合起来，进入现代市场竞争，应肯定是适应当时当地需要，为群众所创造的形式，是具有可行性的。当然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在市场竞争中，家族企业也由小变

大，仍占较大比重。在温州，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始终是受到鼓励的。多种经济并存发展中，个体私人成分发展更快一些。

还值得着重提到的事情是全区公用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快速进展。这里有别于他处，这类事业是依靠社会集资为主兴办的。他们已办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几座隧道和大型立交桥，一个飞机场和包机公司，77 万门程控电话，有两个万吨级装卸码头，一个 25 万千瓦发电厂。还建成温金（华）铁路。一座 19 公里的大海堤。10 多年，共集资 40 多亿元，新建农民城几十座，建制镇 142 个，首先带头的是龙港镇，人口已达 14 万。温州市本身也另建新城，规模扩大，面貌一新。全市近 40%的人口过起了城市生活。避免了工业过度分散于一部分乡村，以便利用城镇中心带动作用。此外，还有一处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有 132 个民办科技机构，从业人员千人以上，全国上千个科技机构 10 万余科技人员为温州经济提供各种服务，这几年完成新产品近千项。文化教育设施同步发展，近五年新建私立中学 18 所，民办职业中学 34 所，幼儿园 2 345 所。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形成一个全社会办学新体系。一个正泰集团公司从事低压电器制造业，与上海理工大学合作建立一座理工学院分院。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发展也注入新的生机。粗略估计，上述环境建设，如靠政府财力得用百年时间。可是靠多种投资全体共同举办，不到 10 年就取得现有成就。

今天温州的个体户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经济中的手工业主小私有者的守旧心理，我们再不宜用旧观点看待他们了。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正

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温州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但也存在某些消极现象，并因此几次受到指责。最严厉的指责，是认定“丧失了政权”“比资本主义还坏”。这几次指责使温州市工作上出现所谓“四起三落”，还影响到一些坚持改革的干部在使用上一度受到歧视。好在毕竟时代变了，邓小平理论已受到大众的拥护。在国内对“温州模式”的评价并非万众一词，有的人并不附和上述指责并发出不同声音。先后随三次投诉、由国务院指派的三次调查人员，大体能做到实事实说，分辨是非。当地领导人也敢于坚持真理，正视工作中偏弊，并把外来的压力，看作挑战和机遇，把精力集中于深化改革工作。上级领导，也都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对温州工作给出公正评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各方对是非利弊的判断更趋于一致。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全社会所表现的一种可喜的良性变化。

温州在经济快速增长中，确实出现过一些消极现象。并如前述，还引发几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温州模式”是姓“资”还是姓“社”。这场争论给人们的启示：

第一，对700多万人口地区的工作，应如何做出评价。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整体上估量其走向，只要大多数群众努力方向和他们领导机构的政策导向，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应当支持他们去大胆实践，根据实践检验来自各方的首先是自己的理论观念。一些消极现象既然存在，把它揭露出来，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以偏盖全。还要比较一下，一个物质贫乏，

经济发展停滞的社会，变成一个渡过温饱走向小康的社会，哪一个更接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有利还是有害于中国社会。只有把这个前提肯定下来，对现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性事物，以推进改革为宗旨，进行揭露批评，才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对于业已出现于当地的消极性社会现象本身，要做必要鉴别和分析。特别受到人们指责最多的几种现象有：私人经济的发展挤压了国有经济成长；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违反劳动法剥削工人；一切向钱看，钱权交易横行；暴发户的奢侈浪费；为活人修坟墓、乱占耕地；赌博、卖淫屡禁不止等。把所有这些现象罗列在一起，据以证明下边一个概念：温州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推理很明显，首先是犯了思维方式的错误。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这里有这些现象，这里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因而政权已经从共产党人手中丧失掉了。这种推论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因为设定推理前提，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本质特征是什么。在党的十三大早已提出又经十五大重新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涵义是什么，在这个阶段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资本主义成分能否除外，如不除外，又应如何对待。提出批评的同志，都是抱着维护社会主义，除恶务尽的热情，向上级提供了材料。我们决不能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只是希望他们能放弃文革时代“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在观察当代改革开放事时，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

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逐一展开讨论，但愿就几项进行讨论，以期取得共识。

所说私人经济挤压了国有经济，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在温州这个特定地点，国有经济成长很慢并在市场环境下竞争不过私人经济。温州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所以一直很小，是由于国家税收就那么多，如果平均分散地用于全国 2 000 多个县，不论产业性质如何大大小小都由国家包下来，势必影响国家在那些非国家兴办不可的基础建设、公共用品生产、科教与其他公益性事业方面增加投入。在这种场合，不能只看得到什么，还要看因此而放弃了什么。温州这类地区，国家既不可能大力支持发展国有经济，又要限制发展私营经济，希望得到的不可能得到，能办到的，反而被迫放弃，从而导致大量居民缺乏就业机会，社会稳定也难保持，还谈什么小康富裕。这难道称得上最好的选择？个体经济，小资本、小商品，靠人力、靠勤奋、靠市场，创业就业、脱贫致富有什么不好。

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这种趋势是不容忽视的。但这要用全社会分阶层对比的数量分析，加以证实。不能看到几家暴发户，就得这种结论。在市场条件下，竞争是平等的，但参与竞争的各类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却有差别。在这种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收入，出现差别也是不可避免的。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一贯地坚持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原则，不能任其自流。但主要途径应当是从物质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为绝大多数劳动者创造发展机会和生存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实现社会公平，不能离开发展，片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追求公平分配，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

权钱交易引发的腐败现象，这是我党面临的一个全国性重大问题。问题所以显得严重化，是因为在两种体制转型时期，要避免无准备的改革措施引起社会过度震动，不能不经历双轨制阶段。这时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经济变化。还没有由直接管理企业经济事务为主转到以执行宏观调控为主的地位。政府的经济权力，易于被内部某些蜕化分子利用，形成权钱交易。必须保持警戒，加强打击力度，防腐倡廉。还须深化改革，缩短双轨制过程，扼制腐败风气继续膨胀。但必须指出，即便进入完全的市场经济轨道，还不能就此一举消灭腐败现象。对一个执政党来说，防止腐败蜕化，必须改革与完善政治体制，坚持民主法制，广开言论，接受群众监督，毫不可懈怠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整顿队伍，清除腐败分子。

关于群众迷信鬼神、大修坟墓，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温州最早风行。占耕地本来是不难命令禁止的，但破除迷信却不那么简单。像非法的宗教活动，及其他各类迷信习俗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后的今天，又到处复活了。真正问题所在，是这些旧社会遗物没有“死”，它还活在一部分群众的心里，它的根子扎得很深，死掉的只是枝叶，只要有适宜的环境，就会复活。封建迷信是侵占人们的心田，这比侵占土地更为隐蔽也更难治理。马克思讲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可是宗教较之其他迷信更具复杂和普遍性质，它既存在于贫困落后时代，也存在于物质富裕和科学发达时代。在西欧，它既充当封建专政制度的卫护士，也充当过资本主义文明的

助产婆。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变迁之间存在有依存联系，作为文化现象，又与各个不同地区国家的历史传统相关联。它的影响消长还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利用方式的发展程度，它不会随某一社会制度改变而消灭，我们不可能强迫人们接受无神论，战胜宗教迷信，要依靠正确的宗教政策和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是长期努力过程，不能企望短期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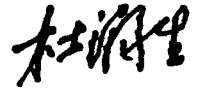
在我国，既然确定了经济发展由市场导向，而市场的商品交换机制是无所选择地提供给所有人可利用的机会，去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这就刺激起人们满足私利的欲望。为满足利欲，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固然是少数，却到处可见。各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如走私、假冒以至赌博、卖淫、搞黑社会组织等恶劣行径也是屡禁不止。我们已恢复了市场经济，但至今还未找到剥离它负面东西，只接受其正面的东西的方法，更不能因此而放弃改革，看来只能制定某些趋利避害的法治规则，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制约负面事物的自流发展。这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上述各种现象引出一个道理，即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无政府无秩序无规则。政府应当大大强化法制职能，而不可稍有削弱。与此同时，还必须鼓励群众性自律自治，使法制与民主互相依托，走向社会主义现代社会。党组织在这方面应发挥作用。

我们在温州看到，几届政府都很少直接干预家庭和企业的经济业务，但在整顿市场秩序、打击不法行为，还是一直抓得比较紧，并取得公认的成就。而且注意引导各类经济主体树立自律意识，发挥自

治组织功能，这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经验。举一例：如通过行业协会、科技协会、信息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内部协议，订立规则，自动改正类似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不良甚至违法行为，鼓励努力创造品牌，提升技术等级，以高质量产品取胜的新风气。政府治理，行会自治，企业自律，典型示范，形成合力，建立市场竞争与合作的新秩序，这种秩序以公众自治作基础，加上新闻舆论监督和传统的道德规范自我约束，日积月累，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形成一代精神文明，一种社会传统，一种上层社会结构，它将发挥反作用于新生的经济基础，推动它健康发展。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建立法治秩序，也正处在学习过程，总难免有缺点和失误，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理由判断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宋文光同志在负责温州改革试验区期间和我多有接触。他10多年来无中断地经历了温州经济政策过程。他的经验和知识是和改革事业成就同步增长提高的。最近他准备将工作过程各时期的讲话和文稿汇集成册出版，让我写个序言，我遂将访问温州所得印象写下来，回应他的要求。印象自然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很粗略的感知，当作序言，用意所在是想推荐作者的文章，让大家了解温州人如何遵从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温州实际出发，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借题发挥，说了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供关心温州发展经验的同志做参考。



1997年12月18日

前　言

1987 年 2 月，中共中央作出有计划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决定。1987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温州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至今整整 10 年。

10 年来，温州试验区以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进行农村各项改革试验，并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我从 1987 年温州试验区建立开始至 1996 年，担任中共温州市委副秘书长与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主持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温州市委确定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是：及时分析温州市改革试验的新形势，研究改革试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措施，协助市委、市政府制订改革试验的重大政策规定，组织实施，协调关系。

10 年来，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在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和浙江省委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温州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有关改革试验课题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起草拟订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有关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指导与组织具体实施，总结与推广改革试验的经验和成果。本书收集 12 篇论述，是我在温州市、全省和全国性会议、研讨会上的发言、报告，具体反映了我在改革试验工作的各个时期的思想、观点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方法。作为本书附件资料的10个《政策规定》，主要是由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起草，提交市委集体讨论决定后，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以正式文件颁布实施；5个《调查研究》的材料，是根据当时工作需要和领导的指示，由我主持组织有关同志共同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些调查研究报告，为党政领导决策与制订有关政策规定，提供了实践的依据。

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是温州试验区工作的重点，作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和经济组织形式，还处在不断完善与规范的过程。从1987年11月，温州市颁布第一个《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后，先后又颁布了5个政策性的规定与管理办法，解决股份合作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使股份合作制从自发的状态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稳定地发展。但是，所有这些规定与办法，都是以温州实际和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特点而制订的，同时是在国家尚未颁布有关法律、法规条件下制订试行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作为本书的附件资料，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温州改革试验，是在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进行的，温州10年改革试验取得一定的成功，用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正确。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书是我献给党的十五大一个小小的礼物。

宋之光

1997年9月18日于温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